

基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社区治理路径*

裴福华

(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新疆维吾尔医学专科学校)

王俊秀**

(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摘要 “十四五”规划进一步强调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社会治理功能, 而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着力点。本文首先介绍情感社会学关于“情感共同体”的相关理论, 结合实例阐释心理社区感理论、赋权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等关于社区治理的心理学理论, 然后提出从增强社区凝聚力、弘扬社会核心价值观、赋权居民和社区社会组织、化解社区消极情绪、满足居民需要等社区心理建设方面探索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下的社区治理, 最后结合当下社区心理建设现状展望未来社区治理。

关键词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社区治理 社区心理建设 心理社区感 赋权理论

2017年10月, “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表述出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治理的部分中, 指出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作为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项重要举措。“十四五”规划进一步强调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社会治理功能。国家在全国建立了社

* 本文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批准号: 21JZD038)和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批准号: CXJB21003)资助。

** 通讯作者: 王俊秀, 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E-mail: nmwjx@sina.com。

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有学者研究了全国12个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地区相关文件,发现这些试点地区的定位基本是“心理健康”(池丽萍,2018)。其实,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除了关注个体心理健康,还涉及人际和家庭关系和谐、组织和群体管理、青少年教育和成长、社会安全防范、社区和环境营造等领域(王俊秀,2019),主要包括社会心态培育、社会心理疏导、社会预期管理、小区治理的心理学策略的运用等内容(辛自强,2018)。

小区治理是小区治理的基础,小区治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小区治理的成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创新的小区治理方式,对于小区治理有指导作用。目前,在小区治理中存在忽视心理建设的现象,可能会导致好的政策在落实中出现社区居民不认可,甚至事与愿违的结果。社会心理建设作为小区治理的心理学路径(王俊秀,2017),包含社会环境、社会稳定、心理健康、社会凝聚力、社会共识、社会价值观、社会情绪等方面的建设(王俊秀,2015a)。因此,可以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下推动小区心理建设,从而实现优化小区治理的目标。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在于促进社会团结(许燕等,2020)。社会情感是社会团结的“黏合剂”,可以说社区情感建设是社区心理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关于社会情感的情感社会学理论探讨了社会文化、权力、地位和仪式等对社会情感的作用,同时结合心理社区感理论,可以为社会情感的激发、维持或者消除提供理论支持。还有,赋权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分别在促进社区参与和发挥社区的整合功能方面提供理论指导。

一 基于情感共同体的社会学理论

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社区”(community)概念时,强调把社区打造成“情感共同体”。然而,后来出现了“共同体衰落”危机,以至于80年代兴起的社群主义和90年代提出的“好社会”都提出重塑“共同体”精神,注重社区情感建设(成伯清,2007,2011)。时至今日,日渐冷漠的社区居民关系现状更加呼唤“情感共同体”。在小区治理中,打造“情感共同体”,需借鉴情感社会学中的情感理论,充分发挥积极情感的“黏合剂”作用。

情感社会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更多关注持久的情感,强调

将情感与人际互动和社会文化结合起来讨论。社会学对社会情感类型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 互动情感，即与个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不同地位相关的情感倾向、情感状态和情感过程；(2) 群体和集体情感，即个体在特定社会情况下作为一个群体或者集体的成员经历或表达的情感；(3) 情感氛围和文化 (Bericat, 2016)。为了理解和解释社会现实的情感结构和情感动力，社会学家发展出了文化理论、符号互动理论、情感结构理论、仪式理论和交换理论 (Turner & Stets, 2006)。结合社区的实际情况，这里简要介绍前四个理论。

文化理论认为情感是社会感受，受到社会文化（规范、价值观、观念、信仰等）的制约。社会有情感文化、情感词汇、感受规则和展示规则，这些限制了处在不同情境和社会地位的主体应当如何感受和表达情感 (Hochschild, 1979)。

符号互动理论认为，自我和身份构成了情感激发背后的动力。当自我被他人所确认，并受到文化标准的良好评价时，人们将体验和表达积极的情感，比如骄傲和满足。当自我没有被确认，自我概念和他人的反应不相符，以及文化观念与自我知觉不协调时，人们会经历负面情感，比如窘迫、焦虑、愤怒、羞耻或内疚 (Turner & Stets, 2006)。

Kemper (1987) 提出情感结构理论，解释了主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感受到的情感类型，侧重于特定的关系特征。权力和地位是涉及情感的两个基本的关系维度。拥有权力或在互动中获得权力的主体，会体验到如满意、自信和安全等积极情感；而权力相对较小的主体则会体验到恐惧等消极情感。地位高的主体或者受到他人尊重的主体，会产生积极的情感，比如骄傲；而缺乏或者失去地位的主体，会产生消极情感，比如羞耻。

仪式理论认为仪式是一种社交聚会，个人在其中保持相同的注意力，分享相同的价值观和感受相同的情感。仪式产生了群体情感，人们总是寻求在每次社交中最大化他们的情感能量。柯林斯 (2012) 提出情感能量，并认为它是正向情绪和负向情绪由高到低的连续体。高的情感能量具有团结性，低的情感能量会瓦解团结。他进一步指出，人们在共同的行动或事件中分享的共同的情绪和情感体验会产生集体兴奋，从而可能出现群体团结、个体情感能量、代表群体的符号和道德感。人们面对面互动时，暂时仪式唤醒情感，同时在互动过程中生成较持久的情感，并且能够在互动者

之间传递，从而把情感的力量赋予互动者。

二 社区治理的心理学理论

（一）心理社区感理论

心理社区感理论由 Sarason 提出，他认为心理社区感是一种“感觉到与他人的相似性，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既有的、相互支持的、可以依赖的关系网络的一部分，愿意保持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向他人提供他人期待的帮助，对于大型的、可依靠的和稳定的结构的归属感”（Sarason, 1974）。Mc-millan 和 Chavis（1986）发展了此理论，提出心理社区感包括 4 个成分：成员资格、影响、整合和满足需求，以及共享的情感联结。其中，成员资格是指人们体验到的归属所属社区的感受；影响表示的是人们感受到自己可以使社区发生改变；整合和满足需求表示社区成员相信社区提供的资源可以满足其需要；共享的情感联结指的是社区成员拥有并愿意分享共同的历史、时光、空间和经验。Long 和 Perkins（2003）结合他们的数据提出心理社区感的三因素结构：社会联结、相互关心和社区价值。Tartaglia（2006）使用意大利样本发现一个三因素的测量结果，即地方依恋、需求的满足与影响，以及社会纽带。

生活中的个体倾向于与自己相似的、邻近的人建立情感联结，在社区中同时追求尊重多样性和培育心理社区感并不可取，需要更好地平衡尊重多样性与培育心理社区感之间的关系（Neal & Neal, 2014）。参与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心理社区感（Hughes et al., 1999）。心理社区感与信任正相关，心理社区感是友谊等积极的人际关系的结果（Jason et al., 2016）。

（二）赋权理论

赋权是一个过程，是个人、组织和社区掌控其事务的机制，使人们获得对个人生活和所在社区的控制，包含个体对生活的决心（Rappaport, 1981, 1987）。针对赋权的特性研究发现，赋权在时间上动态发展，具有不同的层次，个人、组织或社区都可以被赋权，但某一层次的赋权并不一定引起其他层次的赋权；赋权只有参与到一个团体或组织中才能实现；针对

各个组织、地域、社区和文化的赋权因不同的历史、经历、环境而不同 (Zimmerman, 2000)。

从 2005 年起, 国家免除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贫困家庭学生义务教育阶段的书本费、杂费, 并补助寄宿学生的生活费 (即“两免一补”)。2005 年财政部对中西部地区安排“两免一补”资金 72 亿元, 在 592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 共有 1700 多万名贫困生享受了“两免一补”。从 2017 年起实行城乡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两免一补”政策使更多贫困家庭的学生走进校园接受义务教育, 培养了能力, 提高了对今后生活的控制力, 这其实就是一个赋权的过程。再如, 在国家倡导社区治理创新中, “沈阳模式”强调把部分权力下放给居民, “江汉模式”重视把权力下放给社区自治组织, “盐田模式”提出把社区服务站建成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种服务的自治性组织。权力下放与这里的“赋权”虽有些不同, 但两者目标都是建设社区自治组织。

(三) 生态系统理论

Bronfenbrenner (1977) 描述了可能影响儿童发展的生态系统的四个水平。微观系统是个体直接接触和生活其中的系统, 由个人的身体特征、活动和角色组成。社区和学校也属于微观系统。中观系统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微观系统相互作用的地方, 比如, 学校与家庭的相互影响。外观系统影响个人和个人所处的微观与中观系统, 但个体不能在其中获得直接经验。例如, 家庭成员的工作环境, 学校管理体制等。宏观系统不包含具体的环境, 是决定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更大系统, 包括法律、文化、价值观或宗教信仰等, 例如当前的失业率、社会中的性别分工等。

按照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 在中观系统中学校和社区可以共同作用。例如, 针对肥胖症和癌症在美国流行的问题, “带它回家”示范项目 (“Bring it Home” demonstration project) 选取了非裔低收入家庭的四年级学生, 让他们在学校学习有关健康饮食的知识, 然后将学习的录影带和其他资料带回家中与父母分享。与此同时, 项目工作人员对学生家长开展有针对性的随访沟通。结果显示, 与作为参照组的学生相比, 那些参与此项目的学生父母会食用更多的水果、果汁、蔬菜, 而且在干预结束后, 其平均体重也变得较轻 (默里等, 2018)。

三 以社区心理建设为主线的小区治理路径

社会心理建设是通过全社会的努力使得社会心态环境不断改善,个人和社会的心理更加健康,社会关系更加和谐,社会逐渐形成共享的价值观念,具有更高的社会和国家认同度、社会凝聚力更高、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实践(王俊秀,2015b)。从微观上看,这也可以浓缩成社区心理建设的目标,即追求社区关系和睦、居民心理健康、生态环境良好、具有共享的核心价值观和社区凝聚力更强等。

社区心理建设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根据情感社会学的理论,文化影响着情感的感受程度以及表达方式;仪式可以为民众提供更多的人际互动的机会,在仪式中情感能量得以维持和传递;权力、地位、自我和身份均可以对情感产生影响。另外,根据心理社区感理论和赋权理论,通过培育心理社区感能够让居民产生对社区的归属感,进而产生共享的情感联结,通过赋权可以提升个体或者集体的效能感,进而可以提高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生态系统理论可以诠释对社区环境建设以及发挥社区、家庭和学校整合作用的重要性。下面结合这些理论,以社区心理建设为主线,从增强社区凝聚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赋权居民和社区社会组织、化解社区消极情绪、满足居民需要等方面探索社区治理路径。

(一) 增强社区凝聚力,培育心理社区感

在滕尼斯看来,社区是在情感、传统和共同联结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较强价值认同的共同体,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是建立在自然情感基础之上的,这种共同体具有天然的凝聚力。根据心理社区感理论,共享的情感联结和成员资格促进了心理社区感的形成。一旦形成心理社区感,居民邻里间会通过分享共同的历史、时光、空间和经验,增加彼此信任,进而会增加更多非正式的接触、沟通,促进正性情感能量在居民之间的流通。人际互动可以为居民提供情感联结的机会,使居民对社区形成归属感和依恋,意识到其是社区的成员,进而培育居民心理社区感。可以看出,加强人际互动是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培育心理社区感的一种有效措施,其背后是积极情感在发挥“黏合剂”作用。

为了促进居民的人际互动,社区要经常开展多样的集会,也就是仪式理论中所指的“仪式”。比如,某社区在端午节开展“端午粽飘香,温暖社区情”包粽子活动,在世界环境日开展“蓝天保卫战,我是行动者”宣传活动。依据仪式理论,人们在共同的行动或事件中分享的共同情绪和情感体验会产生集体兴奋,从而可能出现群体团结和个体情感能量。疫情发生的时候,武汉实行了“封城”,居民待在家里,恐惧、焦虑、苦闷笼罩着整个城市。2020年1月27日20时,多个武汉社区组织居民亮灯并打开窗户,共唱国歌,然后大喊三声“武汉加油”,通过增强唱歌和身体姿态的节奏化同步性,凸显交互的奖励进程,提高社区团结感,每个人心中充满了正性情感能量。

在人际互动中影响积极情感产生的因素有两个:期望的满足和奖励。如果居民在互动中满足了自我、他人以及情境的期望,通常会体验到中等强度的正性情感。当人们知觉到他们获得了他人的奖励时,将体验到正性情感,更有可能给予他人奖励(特纳,2009)。符号互动理论也指出,自我和身份在情感激发中起动力作用。为了激发积极情感,发挥积极情感在促进社区团结中的“黏合剂”作用,社区在组织集会时,要了解居民的期望,提供给每个居民获得自我和身份得到尊重的机会。居民之间在人际互动中要善于给予对方奖励,尤其是情感方面的奖励,比如别人跟你微笑打招呼,你也要热情地回应,只有这样双方才能体验到积极情感。居民之间感觉到彼此的自我和身份得到确认,同时体会到互相之间的情感奖励,就会认同自己是社区的成员,产生心理社区感。

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之间的互动对于社区凝聚力也很重要。根据情感结构理论,社区工作人员拥有更多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他们会体验到满足感、自豪感和自信心等积极情感,他们会向他人表达积极情感。但是在中国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一些社区工作人员可能过度忙于行政事务,更多表现的是缺乏热情、不耐烦、愤怒等消极情绪。社区工作人员应自觉意识到积极情感的流动在社区团结中的作用,加强情绪管理,激发服务的热情,用自身的正性情感能量去感染周围居民产生积极情绪。

(二) 弘扬社会核心价值观,培育社区文化氛围

社会价值观是影响社会认知、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的深层次、相对稳

定的观念体系，它与文化密不可分。不同的社会阶层、文化背景、社会经历等导致了目前社会价值观的多元，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可以说是社会变迁和社会大转型时期的一种必然。社会价值观的多元会导致具有不同社会价值观的个体和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一旦治理中不能很好地平衡这些诉求，它们就会成为社会矛盾或者社会纠纷的导火索。共享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可以对多元的社会价值观起到统领和聚合作用，形成人们判断是非曲直的基本标准，有利于形成良好的道德秩序。只有社会的良性发展才会使得社会共识更容易达成，社会倾向于出现共享的情绪，这些构成了社会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基础。

培育社区文化氛围涉及培育什么样的社区文化以及社区文化如何培育的问题，即社区文化的内容和培育方式。在物质主义价值观日益增强、家族中传统亲情被利益所淡化、个人主义泛滥的社会，要想重新正确地建设中国人的心理，恢复社会的秩序，需要继承和发扬儒家传统文化（王俊秀，2015a）。建设社区文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立脚点，探讨人的“生活世界”的意义性和价值追求，提高社区居民的人生境界，从而促进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黄希庭，2020）。另外，反映时代脉搏的先进优秀文化理应成为社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情感的文化理论，社会文化会影响情感的感受和表达方式。因此，社区文化氛围的培育应挖掘社区文化中可以激起居民情感共鸣的要素，同时对居民的价值观起到引领作用。比如，利用社区活动营造社区美德时，可以选择时代涌现的道德模范事迹。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田琴，婚后十多年来，丈夫外出务工补贴家用，在自己身心极度劳累、腰椎颈椎疾患严重的情况下，无怨无悔、悉心照料家中7位年迈多病的老人。还有窦兰英，中年丧夫、老年丧女，年近70岁的她历时6年，当保姆、做钟点工、捡废品和卖破烂，省吃俭用为女还债。通过宣传田琴的孝老爱亲、窦兰英的恪守诚信的事迹，居民会产生敬意，形成情感共鸣，愿意去效仿她们的行为。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创新社区文化传播方式，挖掘社区历史文化，塑造社区文化符号，进而形成社区文化认同。比如，上海市嘉定镇街道在睦邻文化品牌建设中举办“睦邻文化节”，社区居民和社会工作者通过朗诵、歌曲串烧、活力操、旗袍秀等表演让大家感受到了“睦邻”对当地人的影响，在舞台表演的同时开展“睦邻集市”“睦邻游

戏”“睦邻人物展示”“睦邻才艺展示”“睦邻畅想”等活动,居民潜移默化地受到文化的熏陶。

(三) 赋权居民和社区社会组织, 促进社区参与

在我国,与参与社区文体活动热情比较高相比,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动力不足、意识不强、热情不够。其原因:一是目前社区管理体制的不足。我国社区是一个自上而下建构的实施基层行政管理和社会控制的国家治理单元,国家在这个治理单元运作过程中仍然居于统治地位,居民自主表达利益的集体行动和沟通参与往往受到地方政府的排斥和遏制,自主性的社会发育受到阻滞(杨敏,2007)。二是社区服务意识不强。很多人认为社区只是居住的地方,处理好自己的家庭事务、“扫好自家门前雪”就是对社区的贡献。三是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不足、信心不够。大部分居民由于对社区公共事务的认识不到位,平时很少关心社区公共事务,一旦被赋权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就会推诿。

针对居民社区参与中存在的社区服务意识不强,可以调整居民关于社区参与的不合理的认知,让居民认识到,社区的事务需要大家合力来完成。居民只有在心理上形成社区感,才会产生作为社区成员的自豪感,才会强化对社区结构的承诺。对于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不足和信心不够,赋权居民和社区社会组织是有效的应对措施。赋权理论强调的更多是社区社会组织自下而上地增强处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可以说是培养集体效能感,其实西方赋权理论中的“赋权”可以认为是“自觉赋能”,针对个体是产生自我效能感,针对组织或者群体是产生集体效能感。在个体层面,赋权能够预测居民参与的程度,从而在赋权和居民参与之间形成互为强化的良性循环(默里等,2018)。通过培育居民参与能力,提高参与自我效能感,可以形成参与的积极态度和意图,进而转化为参与行为。

在社区层面,赋权社区社会组织可以更好地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力,与社区工作人员互相配合,把社区工作做得更精更细。目前,社区居委会将基层政府的一部分职能承接下来,社区工作人员要处理发展党员、医养养老、综治维稳、帮困扶困、环境卫生等工作,对于有些事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孤寡老人、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精神病患者、问题少年等群体的陪伴、关怀和照顾。其实,社区社会组织可以在社区服务中

大有作为。目前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尚处在起步阶段，政府的放权赋能是必要的。2020年12月民政部下发的《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案（2021—2023年）》和2021年6月推动的社会组织开展“邻里守望”关爱行动，目标是通过实施一批项目计划和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中更好地发挥作用。赋权社区社会组织，一方面需要政府的放权，为社区组织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要从自下而上的视角提高自己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

（四）处理矛盾纠纷，化解社区消极情绪

社会互动中情感能量影响着社会运行，积极情感能量和消极情感能量分别导致社会团结和社会疏离（王俊秀，2013）。前文论述了积极情绪对于社区凝聚力的作用，社区治理中还要高度重视消极情绪对社区团结的破坏作用。社区消极情绪可大可小，小到因为停车纠纷而彼此抱怨，大到因为小区搬迁处理不公而引发集体愤怒。社区消极情绪的产生，一方面与社会的大环境有关，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和过度的信息处理导致社会情感淡漠，还有社区需要、期望、价值观的多元引起个体或者群体间的摩擦和冲突。另一方面，根据符号互动理论和情感结构理论，当自我和身份没有得到别人的认可，或者当地位较低或权力较小时，个体会体验到愤怒、羞耻和内疚等消极情绪。

根据仪式理论，当居民处于消极情绪时，情感能量偏低，进而对社区团结产生破坏作用。一旦社区公共事务处理不当或者相关政策不合理，怨恨、愤怒等消极情绪就会被激发，并通过居民的私下议论等方式传播蔓延，当消极情绪积累到一定的“燃爆点”就会爆发社区的群体事件。为了防止消极情绪的破坏作用，社区治理中要及时满足居民的社会需求和愿望，提高对可能引起矛盾和纠纷事件的关注度和敏感度。一旦社区矛盾出现，要及时调解和化解，避免消极情绪的传染，裹挟更多不明真相的人参与社区集体行动。同时，在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中，需要尊重多样性，采取居委会、社区组织和居民多元主体共同决策的方式，照顾多方利益，尽量形成理性、公正的决策。另外，在执行政策时少使用惩罚措施，当居民知觉到他们获得惩罚时，将体验到消极情绪，体验到的消极情绪越多，居民越有

可能为保护自我对社区组织产生疏离感。

(五) 满足居民需要, 建设美好社区

十九大报告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已成为新时代的最强音。针对社区来说, 在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要上要特别重视家庭建设和社区环境治理。结合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 社区作为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场域, 发挥社区整合作用是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一环。首先, 要结合居民的需要来建设社区的物理环境。居民需要洁净的空气、无污染的水、合理的住房结构、宜居的社区环境以及安全, 只有这些基本需要被满足, 居民才能体会到生活的美好。试想一下, 在一个嘈杂、脏乱不堪的社区中, 居民如何享受美好生活呢? 因此, 社区要加强绿化, 做好垃圾分类的管理, 在设计社区布局时考虑到给居民提供合理的居住格局, 加强社区内部的车辆管理以及安保工作来满足居民的生活需要。其次, 整合家庭、社区、学校等微观系统。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 在夫妻和睦、养老育幼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当家庭出现了矛盾, 比如夫妻经常争吵, 邻里调解就有可能使夫妻“化干戈为玉帛”。另外, 现在青少年越轨行为越来越多, 比如吸烟、性行为、欺凌行为等, 这些行为可能在学校、家庭和社区均有发生, 家庭、社区和学校只有合力消除青少年越轨行为产生的不利因素, 积极对青少年进行教育引导, 才能有效遏制青少年的越轨行为, 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营造好的环境。

四 总结与展望

在全国大力推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背景下, 注重和加强社区治理势在必行。本文从社区心理建设入手, 从积极情感的唤醒和维持来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培育心理社区感; 从生态系统角度来满足居民的基本社会需要, 同时发挥社区的整合功能来关注社区环境治理; 探讨社区文化的凝聚作用, 弘扬社会核心价值观, 培育社区文化氛围; 通过赋权来提高居民和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 处理社区矛盾并及时化解消极情绪, 防止消极情绪的传染。

当下, 加强社区的心理建设还任重道远。在未来研究中, 可以把社区

的边界扩展到学校、组织等范围，充分发挥社区、学校、组织和家庭在中观系统的合力作用。同时，可针对不同类型的社区的独特性有针对性地开展社区治理，比如针对民族互嵌式社区中民族多样性开展民族融合的研究。另外，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下，加大乡村社区的心理建设力度，为乡村的早日振兴助力。

参考文献

- 成伯清. (2007). 从乌托邦到好社会——西方现代社会建设理念的演变. *江苏社会科学*, (6), 73-78. doi: 10.3969/j.issn.1003-8671.2007.06.014
- 成伯清. (2011). 社会建设的情感维度——从社群主义的观点看. *南京社会科学*, (1), 70-76. doi: 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1.01.012
- 池丽萍. (2018). 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反思. *心理技术与应用*, 6(10), 588-589.
- 黄希庭. (2020). 社区心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的心理学. *社区心理学研究*, 9, 7-9.
- 兰德尔·柯林斯. (2012). *互动仪式链*. 林聚任, 王鹏, 宋丽君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默里·莱文, 道格拉斯·D. 珀金斯, 戴维·V. 珀金斯. (2018). *社区心理学原理: 观点与应用 (第三版)*. 杨莉萍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乔纳森·H. 特纳. (2009). *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 孙俊才, 文军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 王俊秀. (2013). 社会情绪的结构和动力机制: 社会心态的视角.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45(5), 55-63.
- 王俊秀. (2015a). 从社会心态培育到社会心理建设.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5(4), 1-6+37.
- 王俊秀. (2015b-09-07). 社会心理建设 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 *光明日报*, 第11版. doi: 10.28273/n.cnki.ngmrb.2015.009379
- 王俊秀. (2017). 中国社会心态研究30年: 回顾与展望.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50(4), 10-16+158.
- 王俊秀. (2019-01-08). 从心理健康到幸福社会. *光明日报*, 第11版.
- 辛自强. (2018).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定位与思路. *心理技术与应用*, 6(5), 257-261.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8.05.001
- 许燕, 伍麟, 孙时进, 吕小康, 辛自强, 钟年, 彭凯平, 周明洁, 栾胜华, 郭永玉, 王

- 俊秀. (2020). 公共突发事件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笔会). *苏州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8 (2), 1 - 31. doi: 10.19563/j.cnki.sdj.2020.02.001
- 杨敏. (2007). 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 *社会学研究*, 22 (4), 137 - 164 + 245. doi: 10.19934/j.cnki.shxyj.2007.04.007
- Bericat, E. (2016).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Four decades of progress. *Current Sociology*, 64 (3), 491 - 513. doi: 10.1177/0011392115588355
- Bronfenbrenner, U. (1977). Toward an experimental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32 (7), 5 - 13. doi: 10.1037/0003-066X.32.7.513
- Hochschild, A. R. (1979). Emotion work, feeling rules, and social struc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 (3), 551 - 575. doi: 10.1086/227049
- Hughey, J., Speer, P. W., & Peterson, N. A. (1999). Sense of community in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Structure and evidence of validit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7 (1), 97 - 113. doi: 10.1002/(SICI)1520-6629(199901)27:13.0.CO;2-K
- Jason, L. A., Stevens, E., & Light, J. M. (2016). The relationship of sense of community and trust to hope.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44 (3), 334 - 341. doi: 10.1002/jcop.21771
- Kemper, T. D. (1987). How many emotions are there? Wedding the social and the autonomic compon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 (2), 263 - 289. doi: 10.1086/228745
- Long, D. A., & Perkins, D. D. (2003).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index and development of a brief SCI.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1 (3), 279 - 296. doi: 10.1002/jcop.10046
- McMillan, D. W., & Chavis, D. M. (1986). Sense of community: A definition and theor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4 (1), 6 - 23. doi: 10.1002/1520-6629(198601)14:13.0.CO;2-I
- Neal, Z. P., & Neal, J. W. (2014). The (in) compatibility of diversity and sense of community.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53 (1), 1 - 12. doi: 10.1007/s10464-013-9608-0
- Rappaport, J. (1981). In praise of paradox: A social policy of empowerment over preven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9 (1), 1 - 25. doi: 10.1007/BF00896357
- Rappaport, J. (1987). Terms of empowerment/exemplars of prevention: Toward a theory for community psych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5 (2), 121 - 148. doi: 10.1007/BF00919275
- Sarason, S. B. (1974). The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Prospects for a community psy-

- chology. San Francisco: Jossey - Bass.
- Tartaglia, S. (2006). A preliminary study for a new model of sense of communit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4 (1), 25 - 36. doi: 10.1002/jcop.20081
- Turner, J. H. , & Stets, J. E. (2006).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human emotions. *Annual Review Sociology*, 32 , 25 - 52. doi: 10.1146/annurev. soc. 32. 061604. 123130
- Zimmerman, M. A. (2000). Empowerment theory: Psychological, organizational and community levels of analysis. In J. Rappaport & E. Seidman (Eds.), *Handbook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pp.43 -63). New York: Kluwer/Plenum.

The Pathway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Based on Psychosocial Service System

Pei Fuhua

(School of Psych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 China; College of Xinjiang Uyghur Medicine,
Hotan, 848000, China)

Wang Junxiu

(School of Psych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need to “improve psychosocial service system and crisis intervention mechanism” was highlighted a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and the social governance function of psychosocial service system was further emphasized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s the basis and focus of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governance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improvement of psychosocial service system. In this paper, a brief overview of emotional theories was given by focusing on the connection and mechanism of emotion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And Bronfenbrenner’s ecosystem theory,

Sarason's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theory and Rappaport's empowerment theory were introduced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then pathways to improve community governance based on psychosocial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on were proposed in terms of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cohesion, cultivating positive values, guiding social emotions, meeting residents' needs and building a better community. At last, prospects for future community governance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Psychosocial Service System; Community Governance; Community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Theory